

越南人的越战——《同情者》的叙事研究

徐梦媛

西华师范大学

DOI:10.12238/mef.v8i3.11096

[摘要] 越裔美国作家阮清越的越战小说《同情者》被认为挑战了美国主导的越战书写,为战争的最大受害者越南人发出了声音。作者作为美国少数族裔中的少数族裔,如何冲破美国主流的越战书写值得探究。本文立足于经典与后经典叙事学探讨小说的叙事,指出正是因为作者将人物作为叙述者,中途模糊、变换受述者,并通过小说中叙述者与受述者、人物之间的叙述交流生产出自己的文本意义,以此批判美国主导的有失偏颇的越战叙事话语,并试图将焦点转移到越南人身上以期构建公正的越战叙事。

[关键词] 《同情者》; 叙述者; 受述者; 叙述交流; 越战叙事

中图分类号: G125 **文献标识码:** A

Vietnam War of Vietnamese—A Narrative Study of *The Sympathizer*

Mengyuan Xu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Shida Road, Shunqing District, Nanchong City

[Abstract] *The Sympathizer* written by Viet Thanh Nguyen is regarded to challenge the long-standing American-dominated Vietnam War narratives and to voice for the biggest victim, the Vietnamese. It is worth digging how the author made it as he is the minority of the American minorities. Based on the classical and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in the novel, and then points out that it is because of the joint forces contributed by the personified narrator, the obscured and the secret change of the narratee, and the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fferent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that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is produced. In this way, the author achieved his goal to criticize the partial Vietnam War narrative dominated by America, and try to shift the focus on Vietnamese and to construct a just Vietnam War narrative.

[Key words] *The Sympathizer*; Narrator; Narratee;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Vietnam War narrative

引言

《同情者》是美国越裔小说家阮清越的首部长篇小说。小说出版于2015年,2016年斩获第100届普利策小说奖,是美国越裔作家第一次登上主流文学的舞台。书评作者Reba Leiding (2017)赞其为“近年来从亚裔视角描写越南冲突写得最好的小说”;Pat C. Hoy (2015)肯定了这部小说的叙事力量,评价小说“情节曲折”、“扣人心弦”,具有激发读者“解开谜底”的力量;Michael Williams (2015)称阮清越为“西贡的卡夫卡”,称其与文学大师如格雷厄姆·格林、约瑟夫·康拉德以及弗兰兹·卡夫卡产生了文学回响;Bryce Christensen (2017)赞这部小说“引人入胜”,却“极让人不安”,因其阐明了“美国在重建越南的政治和军事企图中失败了,但它成功地借好莱坞掩盖了这场失败”。

小说出版时间不长,国内外研究未成体系,但内外部批评均有涉及。内部批评集中在小说的用典(allusion)和互文(intertextuality)上。(Chihaya 2018;Rody 2017)外部批评则

更多样,有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的(Prabhu2018),也有进行意识形态批评的(Tran2018),国内学者孙璐(2017)考察小说反映的世界主义伦理思想,甘文平和李圻(2019)则解读了小说中的中国形象。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该小说的内部批评,尤其是探究其叙事的研究较为缺乏。以上所举的批评或多或少都承认该小说挑战并动摇了美国的越战叙事,但却没有从叙事学的角度去深究这部小说是如何做到的。将其置于叙事学的考察之下不仅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本,而且通过分析作者如何借助叙事技巧生产和传达出文本的意义、建立自己的权威也对中国在战争文学中重塑战争叙事话语具有借鉴意义。

1 第一人称人格化叙述者——越战叙事话语焦点的转变

叙事就是“叙述事情(叙+事),即通过语言或其他媒介来再现发生在特定时间和空间里的事件。”(申2)有叙事则有叙述者和受述者。叙述者是指“叙述(故事)的人”,受述者是指“接受叙述的人”。伴随着叙述者(作为信息发送者)与受述者(作为信

息接收者)的信息交流则会生产出一定的文本意义。(Prince 66)《同情者》使用第一人称,通篇以主人公“我”展开叙述,极度冒险的同时,又极具吸引力,将以往聚焦于美国和美国士兵的越战叙事话语转变成以越南和越南人为焦点的越战叙事话语。

以第一人称叙述者的美国少数族裔文学,因作家的少数族裔身份,容易被打上自传文学的标签,如汤亭亭的《女勇士》、谭恩美的《喜福会》,因此它们面临着像女性亚文化群体在叙事时同样的困难:身份被标出无法戴上模糊身份的面具或使用超然的第三人称。也无法藏匿于所谓的主流权威之类并使用其话语权。(Lanser 21)《同情者》的主人公就是小说的叙述者,其经历与阮清越的经历颇为相似。都有美国生活经历,都熟练掌握英语,熟悉美国文学文化,都是越南人,都沦为难民逃往美国,因此读者极易将小说中虚构的故事当作阮清越的自传,而将其误读成一位逃往美国的难民实现美国梦的故事,是美国作为“拯救者”的又一次成功案例。因此小说运用第一人称人格化叙事是极具风险的,它不但可能无法传达小说对战争记忆伦理的呼唤,批评美国主导的越战话语,还很可能强化以美国主导的越战叙事的统治地位,加强美国作为越战中“拯救者”的形象。

越战是刺痛美国人神经的一根看不见的钉子,美国在越战中失败,而美国的越战文学却如火如荼地展开,占据了越战叙事的主导地位。美国的越战文学始于1960年代,初期主要描写战争中的英雄主义,以期吸引年轻人积极投入到这场所谓“正义”的、解救越南人民于水火之中的战斗中,如John Hellmann的《美国神话与越南遗产》、Milton Bates的《我们带到越南的战争》、Philip Melling的《美国文学里的越南》都体现出这种积极的情绪;6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深入越南战场,死伤惨重,美国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参战士兵想要在新边疆一展宏图的英雄主义理想受挫,并开始怀疑越战的意义,“战争残酷的现实粉碎了肯尼迪的神话,破灭了士兵们的英雄梦想。他们所渴求的只是活着回家。”(胡,“洞穴里的自得其乐”92),于是70年代末开始,许多美国人开始反思越战,Tim O'Brien这一时期的作品就是从个人角度对越战进行反思以及展现越战带给美国大兵的创伤。科波拉的电影《现代启示录》(1979)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80年代是反思的高潮,许多优秀的越战叙事作品和文学评论喷涌而出,90年代的作品则更多描写越战带来的创伤。越战文学从描写充满乐观、英雄主义的越战、到刻画越战中士兵的消极、失落情绪,再到反思越战、描写美国老兵创伤,其注意力始终在美国和美国大兵身上,对越南人及参战的越南士兵形象刻画却始终阙如,只有一些脸谱化的形象,如“愚昧、懒惰、肮脏、充满奴性而忘恩负义”。(胡,“美国越战中的越南人形象”157)不管是越战初期还是战后,越战文学中美国人是绝对的主角,而越南人则沦为这场战争的背景板,这些越战文学艺术形式不断地向世界输出以美国为中心的价值观,建立利于美国的越战叙事话语,而这场战争最大的受害者越南和越南人常常被忽略,或被扭曲地反映,于是“美国事实上输掉了战争,但是它在越南之

外的世界各国的文化前线赢得了记忆之战,霸占着电影制作、书籍出版、艺术和历史档案的炮制。”(Nguyen, “Nothing Ever Dies” 21-22)。

《同情者》运用第一人称人格化叙述者,虽然有被误读的风险,但不同于美国主导的越战叙事,它将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越南人放在舞台中央,他的检讨书式叙述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丰满的人的形象:一个因间谍身份杀掉同胞,却也拯救同胞、同情同胞的形象;一个既憎恨法国父亲又渴望父亲之爱的矛盾体;一个曾崇拜美国文化却也痛恨美国利用其文化霸权炮制不公的越战记忆的形象。他不再是一个脸谱,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个性的、充满矛盾的复杂的人。此外,第一人称人格化叙述能使读者更容易代入主人公角色,用越南士兵的视角重新经历越战,体会越南难民失去亲人与家园的创伤。同时小说中越战电影《村庄》的拍摄戏仿了《现代启示录》,真真切切地让读者体会到了越战及以美国主导的越战叙事对越南人的双重抹杀。《同情者》的成功,叙述者的设定功不可没,另外作为叙事信息的接收者的受述者同样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同情者》中的受述者的设定也有其独特特点。

2 模糊、变换的受述者——越战主流叙事话语的揭示

越裔是美国亚文化群体中的一支,这里不妨借鉴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中所总结的叙述交流模式来分析其受述者。《同情者》中的叙述交流模式属于兰瑟所说的个人型叙述交流模式,即叙述者是戏剧化叙述交流中的人物。这种叙述形式包括两种,公开叙述交流模式:作者—隐含作者—人格化叙述者—人物—受述者—隐含读者—读者和私下叙述交流模式:作者—隐含作者—人格化叙述者—人物—人格化受述者—隐含读者—读者。(方,“声音与权威”255)其区别是公开叙述交流中的受述者近乎读者,而私下叙述交流中的叙述者则是话语层面中的人物。

有趣的是,《同情者》中这两种叙事交流模式都有包含。在小说前十八章,受述者为北越指挥官和政委,其中共有十处提到受述者。小说的妙处在于,前三章每章都有几句或长或短的句子向读者指出人格化的受述者,此时,叙述模式为私下叙述交流模式,读者能够将自己和受述者区分开,并认识到受述者的地位远高于叙述者,指挥官与政委有权利对叙述者的叙述做出批注和修改,因此叙述者所叙之事难辨虚实真伪。而在第五章之后,随着叙述者叙说故事的深入,叙述者提到人格化受述者的频率越来越低,这使得读者完全沉浸在叙述者对自己间谍生涯以及自己童年的讲述中,非常容易忽视散落于文本中指出受述者的叙述,而将自己当作受述者加入了这场“叙述者—受述者”的交流中,此时叙述模式悄然变成公开叙述交流模式。就像是偷听陌生人讲述其一生的秘密一般,读者享受着窥探别人秘密生活的快感,逐渐接受这就是叙述者真实的间谍生活,同时也接受了叙述者在检讨书中描绘的残酷战争和越南难民在美国现实生活中及越战叙事中沦为背景板的生活。直到第十九章,场景从回忆中的越南和美国切换到叙述者现在所处的北越监狱,读者才意识到

之前的那些叙述是叙述者为了向“指挥官”和“政委”证明自己的无辜和忠诚而写,此时叙述模式又变回了私下叙述,受述者转变为指挥官与政委。叙述者所述内容到底省略了什么,叙述内容的真假,读者再去辨别已为时过晚。前十八章第一人称叙述者对美国的始乱终弃、南越对美国深深的依附、战争的残酷、越南人被视作他者和客体在战场和战争记忆中被抹去和扭曲的叙述已经深深震撼读者,即使到十九章利用大篇幅“我”与指挥官的对话来揭示受述者就是指挥官和政委也很难转变读者对叙述者的同情与认同。

小说在叙事中悄无声息地在前十八章模糊并悄无声息地更换受述者,形成了读者直接与叙述者的互动交流,文本意义直接传达到读者,因此小说有效地向读者揭示了越战的残酷以及越战记忆与越战叙事被美国掌控的局面。除叙述者、受述者与读者的互动之外,小说意义的生产也离不开小说人物之间交流。

3 人物间的交流——叙事话语的挑战

小说人物(character)属于‘故事’层,有别于‘话语’层的叙述者(narrator)和受述者(narratee)。(Margolin 52)《同情者》将主人公作为叙述者,使得“故事”层与“话语”层交错,因此小说中人物之间的交流对意义的生产和传达尤为重要。虚构世界中的人物处于不同的阶级,来自不同的背景,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各种权利关系,这些关系也就同时反映出了文本的主题意义。(方,“声音与权力”64)。《同情者》中人物众多,各人物间的交流构建了复杂的意义之网。因其特殊的检讨书叙述形式,小说中人物的叙事交流都是围绕叙述者展开的,依赖于叙述者的视角与话语。因此考察人格化叙述者“我”与其他人物的交流有助于厘清其主题意义的生产。

小说中众多人物中,有一个不太不起眼的角色——理查德·赫德,他在小说意义的生产中起着重要作用。赫德是从英国移民到美国的学者,因其关于东方与共产主义的著作而声名显赫。小说第十五章叙述者一五一十地引用了一次会面中“我”与赫德博士的对话。赫德与“我”同是外来人,但赫德作为曾经的殖民者,现在的“拯救者”,问话咄咄逼人,而“我”作为难民,作为“被拯救者”,回答如履薄冰,这使得两者之间的交谈变成了强者对弱者的霸凌或弱者的奉承。在回答越南难民如何成为美国人时,“我”认为越南难民“也主张像美国人一样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294),而赫德并不肯定“我”的回答,却反问“我”是否幸福,这一反问揭示了赫德怀疑越南难民能否拥有这样的权利,毕竟他认为“美国人的确享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很多美国人肯定得不到幸福”(295)。作者借“我”与赫德的对话讥讽了美国《独立宣言》中所称的“一切人生而平等,人们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只不过这成为美国主流阶级的特权,而越南难民被排除在主流之外。

在另一段对话中,作者再次借“我”与赫德的对话批判了西方一直诟病东方的生命观问题。在此对话中,赫德博士得出结论,“在东方,人多命贱…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么尊重生命”(301),

这一言论旨在为美国发动越战导致越南人大量伤亡开脱罪证。在这次见面伊始,“我”与将军,议员与赫德代表了越南与美国、弱与强的两个阵营。在战场上,美国充当着拯救越南的形象,而在这场会面中议员与博士仍然充当着拯救者形象,而将军与“我”则是战后亟需受助的对象。赫德所认为东方人视生命如草芥的观点与越战时的美国政客、将领、士兵所持的观点如出一辙。美军驻越总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常对士兵说,“他们是亚洲人,他们对死亡的态度与我们不一样。”(Karnow22)一名越战老兵认为“美国大兵是真实的,美国人被杀了,就是真实的损失。但是如果一个越南人被杀了,就像我走出去踩了只蟑螂一样”。(Baker85)文本意义在叙述者“我”与赫德博士的这番对话中被生产出来:在美国人眼中,生命确实是无价的,但仅限于美国人或西方人,而越南人(东方人)的生命是如同草芥的。

不管是赫德对幸福的论述还是对东方人生命观的结论,都充斥着强者对弱者的藐视。在故事层面上,“我”虽意欲反驳其观点,但畏其强权,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却无奈只能转为对赫德的阿谀奉承以求自保,在这一层面上美国人又获得了一次胜利。然而,在话语层面上,第一人称人格化的叙述者如实记录下与赫德的对话,让读者自己去评判赫德的观点。读者戴着叙述者的面具亲历了这场战争、死亡、离别与抹杀,很显然更愿意相信“我”的阐述,而赫德博士的这番“高论”自然而然被视为发动战争、矮化难民以及书写不公正的越战叙事的遮羞布。处于话语层面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亲自揭开这层遮羞布,从而达到在话语层上解构赫德所代表的美国越战叙事的权威。

小说中类似的交流还有很多,但无一例外,在故事层面“我”虽然发出了声音,但不得不迎合对方的观点,即使反抗、试图改变对方的观点和行动(如与电影导演亚瑟的交流),也无济于事,声音只能被强权淹没。而在话语层面,小说通过独特的叙述者设定和读者对叙述交流的解码达到了批判并挑战美国越战叙事话语的目的。

4 总结

《同情者》运用第一人称人格化叙述者叙述,虽冒着成为美国越战叙事加固者的风险,但独特的叙事特点生产出文本的意义,并帮助读者戴上“越南人面具”,快速进入越战的历史语境中,通过“亲历”越战与战后越南难民的生活、以及“偷听”并解码小说中人物的交流,在强与弱,“拯救者”与“被拯救者”的对话中,做出自己的判断。文本的意义从而从故事层传达到话语层,进而达到作者批判并挑战美国主导的不公正的越战叙事的目的,构建自己作为越裔美国人为越南人书写越战的权威。

南充市社会科学研究“十四五”规划课题“《同情者》中的叙述交流及意义生产研究”项目编号: NC24C227。

【参考文献】

[1] Baker, Mark. Nam: The Vietnam War in the Words of the Men and Women Who Fought Ther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1.

[2]Chihaya,Sarah. "Slips and Slides." PMLA 133.2 (2018): 364-370.

[3]Christensen, Bryce. "Rev. of The Sympathizer, by Viet Thanh Nguyen."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edited by Lawrence J.Trudeau, vol.405,Gale,2017.Gale Literature Resource Center.

[4]Hoy,Pat C. "Spying with Sympathy and Love." Sewanee Review 123.4(2015):685-690.

[5]Karnow, Stanley. Vietnam:A History. NewYork:Penguin, 1997.

[6]Leiding, Reba. "Rev. of The Sympathizer, by Viet Thanh Nguyen."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edited by Lawrence J.Trudeau,vol.405,Gale, 2017. Gale Literature Resource Center.

[7] Margolin, Uri. "Cognitive Science, the Thinking Mind, and Literary narrative."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Ed. David Herman. Stanford: CSLI,2003.转引自申丹,and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8]Nguyen, Viet Thanh. Nothing Ever Dies: Vietnam and the Memory of Wa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6.

[9]Prabhu,Anjali. "The Sympathizer:A Dialectical Reading." PMLA 132.2(2018):388-395.

[10]Prince,Gerald. Narratology: The Form and Functioning of Narrative.New York:Mouton,1982.

[11]Rody, Caroline. "Between "I" and "We": Viet Thanh Nguyen' s Interethnic Multitudes." PMLA 133.2 (2018):406-412.

[12]Tran, Ben. "The Literary Dubbing of Confession." PMLA 133.2(2018):413-419.

[13]Williams, Michael. "Kafka in Saigon." The World Today71.4(2015):47.

[14]方小莉.声音与权力:文本中的意义生产理论[J].当代文坛,2013(1):60-65.

[15]甘文平,李圻.解读越裔作家阮清越的越战小说《同情者》中的“中国形象”[J].外国语文研究,2019,5(02):18-24.

[16]胡亚敏.洞穴里的自得其乐——论美国越战叙事文学中意识形态的作用[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16(1):49-55.

[17]阮清越.同情者.Trans.陈恒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18]申丹,and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9]孙璐.“同情的困境:《同情者》中的世界主义伦理与反讽主义实践”外国文学研究39.03(2017):112-121.

[20]苏珊·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Trans.黄必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转引自方小莉.“声音与权威:叙述交流模式探析.”中外文化与文论2002.01(2017):251-260.

作者简介:

徐梦媛(1995--),女,汉族,四川夹江人,硕士,助教,文学文本分析。